

目 次

一八八七年

问题 / 3

阴谋 / 11

旧房 房东讲的故事 / 16

冷血 / 23

昂贵的课业 / 42

狮子和太阳 / 49

灾祸 / 54

吻 / 61

男孩们 / 80

卡希坦卡 故事 / 88

某小姐的故事 / 109

一八八八年

无题 / 117

困 / 122

草原 游记 / 129

纠纷 / 231

灯光 / 251

美人 / 290

命名日 / 299

精神错乱 / 335

鞋匠和魔鬼 / 361

一八八九年

打赌 / 371

公爵夫人 / 379

题解 / 392

美人

—

我记得当初我还是中学五六年级学生的时候，有一回跟我爷爷一块儿坐车从顿河区的大克烈普科耶村到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城去。那是八月里一个炎热的白昼，叫人烦闷得难受。骄阳似火，干燥的热风把一股股尘土向我们迎面刮来，弄得我们的眼皮粘在一块儿，嘴里发干，既不想观赏风景，也不想谈话，更不想思考了。每逢睡意朦胧的车夫乌克兰人卡尔波扬鞭打马，鞭梢碰到我的制帽，我总是既不抗议，也不出声，只是从昏睡中醒过来，无精打采而又温和地瞧着远方，隔着尘烟看一看有没有村子。为了喂马，我们在亚美尼亚人的一个名叫巴赫契-萨里的大村子里，在爷爷认识的一个富裕的亚美尼亚人家中停下来。我生平从没见过什么人比这个亚美尼亚人更滑稽。请您想象一个小小的、剃光的脑袋，脸上生着两道倒挂下来的浓眉、一个鸟鼻子、两撇又长又白的唇髭、一张宽阔的嘴，嘴里叼着一根樱桃木做的长烟管。那个小脑袋胡乱地粘在一个消瘦而伛偻的身体上，身上穿一套稀奇古怪的衣服：上身是一件短短的红褂子，下身是一条蓝得耀眼的肥裤子；走起路来叉开腿，脚上趿一双拖鞋。他说话的时候并不取下嘴里的长烟管，一举一动带着纯粹亚美尼亚人的尊严：脸上没有笑容，瞪起眼睛，极力不去注意他的客人。

这个亚美尼亚人的房间里既没有风，也没有尘土，不过仍旧像草原上和大道上那样使人感到不舒服，闷热，无聊。我记得我满身尘土，热得四肢无力，坐在墙角一口绿色的箱子上。没上油漆的木墙、家具、涂过赭石的地板，发出被太阳晒热的干木料的气味。不管往哪儿看，到处都是苍蝇，苍蝇，苍蝇。……爷爷和那个亚美尼亚人低声谈着放牧，谈着牧场，谈着绵羊。……我知道他们要花整整一个钟头才能烧好茶炊，爷爷喝茶也总得喝它一个钟头，然后再躺下来睡上两三个钟头，因此我得用这一天的四分之一时间来等他，这以后就又是炎热、尘土、颠簸的大板车。我听着那两个人嘟嘟哝哝的说话声，开始觉得那个亚美尼亚人、那个放着碗盏的食具柜、那些苍蝇、那些听任骄阳晒进来的窗子，我好像已经看了很久很久，而且一直要到很远的将来才能不看似的，于是我心中充满了对草原，对太阳，对苍蝇的憎恨。……

一个戴着头巾的乌克兰女人端来一个放着茶具的托盘，然后又端来茶炊。亚美尼亚人不慌不忙地走进前堂，嚷道：

“玛西雅！来斟茶！你在哪儿啊？玛西雅！”

这时候传来匆忙的脚步声，有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姑娘走进房间来，穿一件朴素的花布连衣裙，戴一块白色的小头巾。她站在那儿洗茶具，斟茶的时候背对着我，我只看得见她的腰很细，两只光光的小脚让长裤腿盖住了。

主人请我去喝茶。我就在桌旁坐下，瞧着递给我茶杯的姑娘的脸，突然间，我觉得仿佛有一股风吹过我的灵魂，吹掉灵魂里这一天的种种印象、烦闷和尘土。我看见了一张以前在现实生活里和在梦乡中从没见过的最美丽、迷人的脸。原来我面前站着一个美人，如同一道闪电似的，我第一眼就瞧出来了。

我愿意起誓：玛霞，或者按她父亲的称呼，玛西雅，是个真正的美人，不过要证明这一点我却办不到。有的时候天边胡乱地挤集着许多云，

藏在后面的太阳给那些云和天空染上各式各样的颜色：紫红、橙红、金黄、淡紫、暗红；这朵云像一个修士，那朵云像一条鱼，另一朵云又像缠头的土耳其人。晚霞布满天空的三分之一，照亮教堂上的十字架和地主房子上的窗玻璃，倒映在溪流和水塘里，在树木上颤抖；远远的，远远的，有一群野鸭，背衬着晚霞，飞到什么地方去过夜。……一个牧童赶着许多牛，一个土地测量师坐着马车走过水坝，几个老爷在散步，他们都瞧着落日，个个都认为这种景色美丽极了，然而究竟美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

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个亚美尼亚姑娘美丽。我爷爷是个八十岁的老人，为人古板，对女人和大自然的美素来漠不关心，这时候却也亲切地瞅了玛霞整整一分钟，问道：

“她是您的女儿吗，阿威特·纳扎雷奇？”

“是我女儿。她是我的女儿……”主人回答说。

“很漂亮的一位小姐，”爷爷称赞说。

画家会说这个亚美尼亚姑娘的美丽是古典的，严谨的。这恰好是这样的一种美：上帝才知道是什么缘故，您只要一看到它，就会很有把握地认定，您看见了端正的相貌，那头发、那眼睛、那鼻子、那嘴、那脖子、那胸脯、那年轻的身体的一切动作，合成一个完整而协调的和音，在这方面，大自然连一个最小的细节也没有做错。不知什么缘故，您觉得一个理想的美女恰好就应当有玛霞那样的鼻子，笔直，带一个不大的弯钩，也应当有那样又大又黑的眼睛，那样长长的睫毛，那样娇慵的眼神。您觉得她黑色的鬟发和黑眉毛正好跟她额头和脸颊的白嫩的颜色相配，就跟绿色的芦苇正好跟安静的小溪相配一样。玛霞白皙的脖子和她年轻的胸脯还没充分发育起来，然而您觉得要塑造它们却必须有巨大的创造才能才行。您看着她就会渐渐生出一种愿望，想对玛霞说一点异常愉快、诚恳而且跟她本人一样美丽的话才好。

起初我不高兴，害臊，因为玛霞一点也不理睬我，始终低下眼睛瞧着地下。我觉得，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幸福而骄傲的空气，把她和我隔开，严密地保护着她，不让我的眼光接触到她。

“这，”我想，“是因为我周身满是尘土，而且给太阳晒黑了，还因为我只是个小孩子罢了。”

不过后来我渐渐忘掉自己，把全身心都投进美的感觉里去了。我已经想不起草原的乏味，想不起尘土，听不见苍蝇的嗡嗡声，尝不出茶的味道，只觉得在我对面，隔着一张桌子，站着美丽的姑娘。

我的美的感受有点古怪。玛霞在我心里引起的既不是欲望，也不是痴迷，又不是快乐，而是一种虽然愉快却又沉重的忧郁心情。这种忧郁模模糊糊，并不明确，像在梦里一样。不知什么缘故，我忽然怜惜我自己，怜惜我爷爷，怜惜那个亚美尼亚人，甚至怜惜亚美尼亚姑娘本人了。我有一种心情，仿佛我们四个人都失去了一种人生中很重大而必要的东西，一种从此再也找不回的东西。我爷爷也有些忧郁。他不再谈牧场，谈绵羊，却沉默下来，呆呆地瞧着玛霞出神。

喝完茶后，我爷爷躺下来睡觉，我就走出房外，在门廊上坐下。这所房子跟巴赫契-萨里所有其他的房子一样，建在向阳的地方，没有树木，没有遮阳，没有阴影。亚美尼亚人的大院子里长满锦葵和滨藜，尽管天气炎热，却生气勃勃，充满欢乐。院子里东一道篱笆，西一道篱笆，在一道矮篱笆后面，人们正在打谷子。打谷场正中安着一根柱子，有十二匹马拴在一起，形成一个很长的半径，绕着那根柱子奔跑。旁边有一个乌克兰人走来走去，上身穿长坎肩，下身穿肥大的灯笼裤，扬起鞭子抽马，嘴里吆喝着，从他的声调听起来好像他有意嘲笑那些马，对它们显显威风似的：

“啊—啊—啊，该死的！啊—啊—啊……没叫你们遭了瘟才好！你们害怕了？”

那些马有枣红色，有白色，有花斑色，它们不明白为什么逼着它们踩

着小麦的麦秸，在一个地方团团转。它们不大乐意地跑着，仿佛很吃力，而且不高兴地摇着尾巴。风从它们的蹄子底下卷起一团团金黄色谷壳的烟雾，送到篱笆外面远远的地方去。在那些高高的新麦垛旁边，聚集着一些女人，手里拿着耙子，有几辆大车在走动。麦垛后面，在另一个院子里，也同样有那么十二匹马绕着一根柱子奔跑，也同样有那么一个乌克兰人抽着鞭子，嘲笑那些马。

我坐的那层台阶发烫；由于天气炎热，那些细栏杆和窗框子这儿那儿冒出树胶来。在台阶下面和百叶窗下面那些长条的阴影里，有些红色的小甲虫挤在一起。太阳既晒我的头，也晒我的胸脯，还晒我的后背，不过我没理会这些，只感到我身后有一双光脚在前厅、在房间里踩响木板地。玛霞收拾完茶具，顺着台阶跑下来，朝我这边带来一股风，像鸟似的飞进一个不大的、被烟熏黑的厢房里去了。那儿多半是厨房，从那里飘来烤羊肉的气味，传来亚美尼亚人气冲冲的说话声。她走进那个乌黑的门口就不见了，紧跟着门口出现一个红脸膛的亚美尼亚老太婆，驼着背，穿一条绿色的肥裤子。这个老太婆正在生气，责骂一个什么人。不久门口出现了玛霞，厨房的热气弄得她的脸发红，肩膀上扛着一个很大的黑面包。她在面包的重压下优美地弯下腰，穿过院子，往打谷场跑去，然后跳过矮篱笆，钻进金黄色谷壳的烟雾，转到一辆大车后面，不见了。那个赶马的乌克兰人放下鞭子，停住嘴，默默地往大车那边看了会儿，然后，等到亚美尼亚姑娘又在那些马身旁一闪而过，跳过篱笆，他就用眼睛跟踪她，用仿佛很伤心的语调对马吆喝一声：

“哎，巴不得你们死了才好哟，魔鬼！”

后来，我一直听见她的光脚不断走动的声音，看见她带着严肃而操心的脸色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她时而跑下台阶，带给我一阵风，时而跑进厨房，时而跑到打谷场去，时而跑出大门以外。我为了看她，几乎来不及扭动我的脑袋。

她带着她的美越是常常在我的眼前闪来闪去，我的忧郁也就越沉重。我既怜惜自己，又怜惜她，还怜惜那个乌克兰人。每逢她穿过谷壳的烟雾往打谷场跑去，他总要用眼睛忧郁地跟踪她。莫非这是我对她的美丽的嫉妒？或者，莫非我惋惜这个姑娘不属于我，而且永远也不会属于我，我在她眼里是个陌生人？或者，这是因为我隐隐感到她那种少有的美是偶然的，不必要的，而且像人间万物一样，不会长久存在？或者，我这种忧郁也许是人见到真正的美的时候总会产生的那种特殊感触吧？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三个钟头的等候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觉得我还没有把玛霞看够，卡尔波却已经赶着车子到河边，给马洗好澡，开始套车了。湿淋淋的马舒服得喷着鼻子，伸出蹄子踢车杆。卡尔波对它吆喝一声：“回—去！”我爷爷醒过来了。玛霞为我们推开吱吱嘎嘎响的大门，我们坐上车子，走出了院子，一路上都不开口讲话，好像互相生气似的。

过了两三个钟头，远远地出现了罗斯托夫和纳希切万，这时候，一直沉默着的卡尔波却很快地回头看一眼，说：

“那个亚美尼亚人家的姑娘真可爱！”

然后他扬起鞭子抽一下马。

二

又一次，我已经是大学生了，坐着火车到南方去。那是五月间。在一个火车站上（那火车站大概是在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中间），我走出车厢，到月台上去散步。

黄昏的阴影已经投在车站的小花园里，月台上，旷野上。火车站遮住西下的夕阳，不过从火车头里冒出来一团团烟，那最上面的烟带着柔和的粉红色，这就可以看出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

我在月台上散步，发觉大多数散步的乘客老是在二等客车一个车厢附近走动和站定，从他们的神情看来，好像那个车厢里坐着一个有名的人物。我在这个车厢旁边遇见的好奇者当中，除了别人以外，还有一个跟我同车的旅客，他是个炮兵军官，聪明，热情，可爱，就跟所有那些我们在旅途上偶然相识，不久又走散的人一样。

“您在这儿看什么？”我问。

他什么话也没回答，光是往一个女人那边丢了个眼色。那是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年纪十七八岁，穿一身俄罗斯民族服装，头上没有戴帽子，肩膀上随随便便地搭一块小披肩。她不是车上的乘客，多半是站长的女儿或者妹妹。她站在那个车厢的窗子旁边，跟一个上了岁数的女乘客谈话。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我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心里就突然生出先前在亚美尼亚人的村子里体验过的那种感情。

这个姑娘美极了，不管是我还是那些跟我一块儿瞧着她的人，对这一点都毫不怀疑。

如果照通常的方式把她的相貌一样一样拆开来描写，那么她真正漂亮的地方只有她那一头波浪般起伏的、浓密的淡黄色头发，那些头发披散下来，用一根黑丝带扎住，至于那张脸的其余各部分，就或者是不端正，或者是十分平常了。她的眼睛总是眯得很细，这是由于她已经养成一种特殊的卖弄风情的习惯，或者由于近视。她的鼻子微微往上翘着，她的嘴很小，她那张脸的侧面轮廓软弱无力，她的肩膀窄得跟她的年龄不相称，然而这个姑娘却给人留下真正的美人的印象。我瞧着她，就不能不相信：俄国人的脸要显得美丽并不需要具有严格端正的五官，不仅如此，如果这个姑娘没有她那个狮子鼻，而换上另一个端端正正、完美无缺的鼻子，像那个亚美尼亚姑娘一样，那么她的脸似乎还会因此失去它所有的妩媚呢。

姑娘正站在窗前谈话，由于黄昏的潮气而缩起身子，不时回头看我们一眼，一忽儿双手插着腰，一忽儿把一只手举到头上，理一下头发。她又

说又笑，脸上时而做出惊讶的神情，时而现出害怕的样子，我记得她的身体和脸一忽儿也没安静过。她那美的秘密和魅力恰好完全在于这些琐碎而无限优美的动作，在于她的微笑，在于她脸容的变化，在于她对我们投来的迅速的一瞥，在于这些动作的细腻优雅正好跟她的年轻娇嫩相配，跟她在笑语声中透露出来的纯洁灵魂相配，跟小孩、小鸟、小鹿、小树身上为我们十分喜爱的那种脆弱相配。

这是蝴蝶的那种美丽，跟圆舞曲、花园里的闲游、笑声、欢乐十分相称，而跟严肃的思想、悲伤、安宁就格格不入了。似乎，只要月台上刮过一股大风，或者下上一场雨，这个脆弱的身体就会突然萎缩，这种变幻莫测的美丽就会像花粉那样消散了。

“是啊……”在第二遍铃声响起以后我们向我们的车厢走去的时候，军官叹了口气，嘟哝道。

至于这个“是啊”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打算来推敲了。

也许他感到忧郁，不想离开那个美人和春天的黄昏而走进闷热的车厢去吧，或者，他也许跟我一样无端地怜惜那个美人，怜惜自己，怜惜我，怜惜所有那些懒洋洋地勉强走回自己的车厢去的乘客吧。我们走过车站的一个窗口，看见里面有个脸色苍白、头发火红色的电报员坐在电报机旁边，他的鬈发高高地蓬松着，颧骨突出的脸黯淡无光。军官叹了口气，说：

“我敢打赌，这个电报员爱上了那个漂亮的姑娘。生活在旷野上，又跟这么一个轻盈美妙的人儿住在同一所房子里，要想不爱上她，那可得有超人的力量才行。可是，自己是个背有点驼、蓬头散发、平淡乏味、品行端正而不愚蠢的人，却爱上一个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而且有点愚蠢的漂亮姑娘，我的朋友，这是什么样的不幸，什么样的嘲弄啊！或者，事情也许更糟，您不妨设想一下：这个电报员爱上了这个姑娘，同时他却已经结过婚，他的妻子跟他一样背有点驼、蓬头散发、为人正派。……那可

真苦了！”

在我们车厢附近站着一个列车员，把胳膊肘倚在小广场的栅栏上，眼睛往美人站着的那边望。他那憔悴而肌肉松弛的脸浮肿而难看，由于夜间不得睡眠，又经受车厢的颠簸，一直显得疲乏不堪，这时候却表现出感动和十分忧郁的神情，仿佛他在姑娘身上看见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看见了自己的清醒、纯洁、妻子、儿女，仿佛他在懊恼，他整个身心都感觉到这个姑娘不是他的，他已经过早地苍老，粗俗而臃肿，因此他跟普通的、人类的、乘客们的幸福的距离已经像他跟天空那样遥远了。

第三遍铃声敲过，火车头的汽笛响起来，火车就懒洋洋地开动了。我们的窗外先是闪过验票员，站长，然后是花园，那个美人以及她那好看的、像孩子般调皮的笑靥。……

我伸出头去，往后看，瞧见她用眼睛跟踪这列火车，在月台上走着，经过里面坐着电报员的那个窗口，理一下头发，跑进花园里去了。火车站不再挡住西边的天空，旷野就袒露在眼前，然而太阳已经落下去，一团团黑烟笼罩在绿油油、像丝绒般的冬麦地上。春天的空气也好，黑下来的天空也好，车厢里也好，都显得那么忧郁。

一个熟识的列车员走进车厢里来，动手点燃蜡烛。

命名日

—

在命名日宴会上，人们吃过八道菜，谈过无数的话以后，过命名日的人的妻子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起身走到花园里去了。必须不住地微笑和谈话的义务、餐具的叮当声、仆人的手忙脚乱、各道菜中间的长久间歇、她为了对客人遮盖自己怀孕而穿上的紧身衣，都已经使她感到筋疲力尽。她有心走开，离那所房子远些，在阴凉的地方坐一阵，定下心来想想过两个月就要生下来的孩子。她已经养成习惯，每逢从宽广的林荫道往左拐弯，踏上狭窄的小径，那些思想就会来到她的心头。在这儿，在李树和樱桃树的浓荫下面，干枯的树枝常常搔她的肩膀和脖子，蜘蛛网粘到她脸上来，她的脑子里就会升起一个性别未定、脸容不明的小宝宝的形象，于是她开始觉得，亲切地搔她的脸和脖子的，并不是蜘蛛网，而是那个小宝宝；等到小径的尽头出现一道稀疏的篱笆，篱笆的另一边立着那些用陶土做顶的矮而宽的蜂箱，停滞不动的空气里开始散发出干草和蜂蜜的气味，人可以听到蜜蜂的柔和的嗡嗡声的时候，那个小宝宝就完全占据了奥尔迦·米海洛芙娜的心。她往往走到用细树枝编成的窝棚旁边，在一条小长凳上坐下，开始思索。

这一回她也走到小长凳那儿，坐下来，开始思索。然而在她的想象里

涌现出来的却不是小宝宝，而是她刚刚离开的那些大人。她想到自己是女主人，竟丢下客人走开，不免心慌意乱；她还想起在宴会上她丈夫彼得·德米特利奇和她叔叔尼古拉·尼古拉伊奇为陪审制度，为出版问题，为妇女教育问题发生争论；她丈夫争论，照例是想在客人们面前炫耀他的保守思想，不过主要的却是因为他不喜欢她的叔叔，偏要跟他闹别扭。她的叔叔呢，反驳他，对他说的每句话都要挑毛病，为的是向出席这个宴会的人表明他尼古拉·尼古拉伊奇虽然已经五十九岁，却还保持着青春的朝气和自由思想。至于她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自己，她在宴会到了尾声的时候终于忍耐不住，开始笨嘴笨舌地为妇女接受高等教育问题辩护，倒不是因为妇女受高等教育需要加以辩护，只是因为依她看来她的丈夫不公平，她有意气一气他罢了。客人们对这种争论感到厌倦，不过他们又都认为有必要插嘴，说上很多话，其实他们全都根本不关心什么陪审制度，什么妇女教育。……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坐在篱笆的这一边，靠近窝棚的地方。太阳藏到云层里面去了，树木和空气现出下雨前那种阴郁的神态，不过天气仍然又热又闷。那些在圣彼得节前夕在各处树木下面割下的干草，还没有收集拢来，现出凄凉的样子，点缀着凋萎的花朵，冒出浓重的甜腻的气味。四下里静悄悄的。篱笆的那一边有些蜜蜂在单调地嗡嗡叫。……

突然间，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有人顺着小径走到养蜂场这边来了。

“天真闷热啊！”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您觉得怎么样，会不会下雨？”

“会下雨的，我的美人儿，不过要到夜里才会下，”一个很耳熟的男人声音懒洋洋地回答说。“会下一场大雨哩。”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思量，要是她赶紧躲到窝棚里去，人家就不会发现她，照直走过去，她也就不必讲话，不必勉强做出笑脸了。她提起连衣

裙，弯下腰，钻进那个窝棚。可是马上就有一股又热又闷像蒸汽般的空气直扑到她的脸上，脖子上，胳膊上。要不是这儿闷热，要不是黑麦、茴香、细树枝的浓重气味弄得人透不出气来，那么这儿，在草顶底下，在黑暗里，倒很可以躲开客人，想一想她的小宝宝。这儿又舒服又安静。

“这个地方多好啊！”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我们就在这儿坐会儿吧，彼得·德米特利奇。”

奥尔迦·米海洛夫娜开始从两根干枝的缝隙里往外看。她瞧见她丈夫彼得·德米特利奇和客人柳包琪卡·谢列尔，她是个十七岁的姑娘，不久以前刚在贵族女子中学毕业。彼得·德米特利奇把帽子推到后脑壳上，懒洋洋，没精神，因为他在宴席上喝了很多酒。他在篱笆旁边摇摇摆摆地走着，用脚把干草拨成一堆。柳包琪卡呢，热得脸色绯红，像往常那样漂亮，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瞅着他魁梧漂亮的身体的懒散动作。

奥尔迦·米海洛夫娜知道女人们喜欢她的丈夫，她不喜欢看见他跟她们待在一块儿。彼得·德米特利奇用脚把干草拨在一块儿，好跟柳包琪卡坐在草堆上闲谈一阵，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至于漂亮的柳包琪卡温柔地瞧着他，那也不奇怪，然而奥尔迦·米海洛夫娜仍旧恼恨她的丈夫。她想到她马上可以偷听他们所说的话，不由得又怕又喜。

“您坐下，迷人的姑娘，”彼得·德米特利奇在干草上坐下，伸个懒腰说。“这样挺好。哦，您给我讲点什么吧。”

“谁高兴讲！我一讲不要紧，您可就睡着了。”

“我睡着？皇天在上！有这样一对俏眼睛瞧着我，我还睡得着吗？”

她丈夫的这些话，他在客人面前半躺半坐，把帽子推到脑后去的神态，也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他已经被女人们宠坏，知道她们喜欢他，所以每逢跟她们周旋，他惯于用一种特别的口气讲话，而且据大家说，这种口气跟他倒很相配呢。他对待柳包琪卡也跟对待别的女人一样。然而奥尔迦·米海洛夫娜还是有醋意了。

“劳驾，您告诉我，”柳包琪卡沉默了一忽儿，开口说，“人家讲您被人控告，就要受审了，这是真的吗？”

“我吗？对，我就要受审了。……我的美人儿，我已经编进坏人的队伍里去了。”

“那么，为了什么事呢？”

“不为什么，只是……这主要是个政治问题，”彼得·德米特利奇打个呵欠说。“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我这个蒙昧主义者和墨守成规者在一份公文里斗胆用了一个字眼，而那个字眼在我们的区调解法官库兹玛·格利果利耶维奇·沃斯特里亚科夫和符拉季米尔·巴甫洛维奇·符拉季米罗夫这一类圣洁的格莱斯顿^①看来却带有侮辱性。”

彼得·德米特利奇又打个呵欠，接着说：

“我们这儿有个规矩：您尽可以用不赞成的态度评论太阳，评论月亮，爱评论什么就评论什么，可是求上帝保佑，千万别碰自由主义者！求上帝保佑，这种事干不得！自由主义者好比那些糟透了的干菌子，要是您无意间用手指头碰它一下，它就往您身上撒下一股灰尘的烟雾。”

“您出了什么事呢？”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场风波完全是由一件小到无可再小的小事引起的。有那么一位教员，是个僧侣家庭出身的讨厌家伙，他向沃斯特里亚科夫递了一份状子，控告饭铺老板，说那老板在公共场合用话语和行动侮辱他。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当时教员和饭铺老板都醉得一塌糊涂，他们两人的举动都一样恶劣。如果有过侮辱的话，无论如何也是彼此都有份的。沃斯特里亚科夫应该判他们犯了破坏治安罪，叫他们两人各出一笔罚金，把他们赶出法庭了事。然而我们这儿是怎么办事的呢？在我们这儿，最重要的并不是人，也不是事实，而是招牌和头衔。一位教员，不管是什么样

^①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在此借喻“政治家”。

的坏蛋，总归是对的，因为他是教员。饭铺老板可就永远有罪了，因为他是饭铺老板和盘剥取利的人。沃斯特里亚科夫判处饭铺老板坐牢，饭铺老板就上诉到会审法庭去。会审法庭庄严地批准了沃斯特里亚科夫的判决。我呢，坚持我个人的见解。……我有点冒火。……就是这么回事。”

彼得·德米特利奇平心静气地讲着，显出满不在乎的讥诮态度。实际上，这件近在眼前就要受审的事害得他心里七上八下。奥尔迦·米海洛夫娜想起那回他从倒霉的会审法庭回来，一直竭力瞒住家里人，不让他们知道他心头沉重，不满意自己。他是聪明人，因而不能不感到他表白见解的时候做得太过分了。他为了对自己和别人掩饰这种心情，不得不说多少谎话啊！有过多少不必要的谈话，发过多少回牢骚，对那件并不可笑的事发出过多少不诚恳的笑声啊！后来他知道他要受审，就忽然泄了气，心灰意懒，睡不好觉，比平时更多地站在窗前，用手指叩击窗上的玻璃。他不好意思对他妻子承认他心头沉重，这反而惹得她不痛快。……

“听说您到波尔塔瓦省去了一趟？”柳包琪卡问。

“是的，我去过一趟，”彼得·德米特利奇回答说。“前天我才从那儿回来。”

“那儿大概挺好吧？”

“挺好。简直好得很。应当对您说明一下，我到那儿去，正赶上割草的季节。在乌克兰，割草的季节正是最富于诗意的时光。在这儿，我们有大房子，有大花园，有许多人和烦琐的事，所以您不会注意到割草。在此地，一切事情都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那边呢，我的农庄上有五十俄亩草场，平平坦坦，像我的手掌一样。无论您站在哪个窗口，到处都可以看见割草的人。他们在草场上割草，在花园里割草，一个客人也没有，什么杂事也没有，因此不管您愿意不愿意，您所看见的，听见的，感觉到的，只有割草这件事。院子里和房间里弥漫着干草的气味，从日出到日落，镰刀的叮当声不住地响。总之，乌克兰是个可爱的地方。信不信由您，每逢我

在安着吊杆的水井旁边喝水，在犹太人的小酒店里喝淡而无味的白酒，每逢在安静的黄昏听到乌克兰的提琴和铃鼓的乐声，就会有一种迷人的想法诱惑我：索性就在我的农庄上长住下去吧，爱住多久就住多久，远远地躲开会审法庭、聪明的谈话、爱发议论的女人、长时间的宴会。……”

彼得·德米特利奇没有说谎。他心头沉重，确实打算休息一下。他到波尔塔瓦省去纯粹是想避免看见自己的书房、仆人、熟人以及种种促使他想起他受伤的自尊心和他的错误的事物。

柳包琪卡忽然跳起来，害怕地摇晃胳膊。

“哎呀，蜜蜂，蜜蜂！”她尖叫道。“它蜇人！”

“得了，它不会蜇您！”彼得·德米特利奇说。“您的胆子多么小！”

“不，不，不！”柳包琪卡叫道，回过头去从肩膀上看一眼蜜蜂，赶快往回走。

彼得·德米特利奇跟着她走去，带着温情和忧郁的神态瞧她的后影。大概，他瞧着她，心里想着他的农庄，想着离群索居，而且，谁知道呢？也许他甚至想：如果他的妻子就是这个姑娘，年轻，纯洁，生气勃勃，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熏染，也没有怀孕，那么在农庄里生活下去会多么温暖而舒服啊。……

等到说话声和脚步声消失，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才从窝棚里走出来，往正房走去。她想哭。她已经由于嫉妒而十分恼恨她丈夫了。她心里明白，彼得·德米特利奇疲乏，不满意自己，羞愧，人在羞愧的时候总是首先躲着亲近的人，却对外人吐露哀曲，她也明白柳包琪卡不是一个危险的女人，所有那些在正房里喝咖啡的女人也都没有什么危险。然而总的说来，一切又都难于理解，可怕，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觉得彼得·德米特利奇好像已经有一半不属于她了。……

“他没有权利这样做！”她喃喃地说，极力要了解她的嫉妒和对丈夫的恼恨。“他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我要马上把话都对他说穿！”